

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 ■ 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 ■ 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

李建毛 丁送来 刘丰著

中国古代

名瓷鉴赏大系

# 醴陵釉下彩瓷

福建  
美术  
出版社



# 醴陵釉下彩瓷

李建毛 丁送来 刘丰 著

福建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醴陵釉下彩瓷 / 裴光辉主编. — 福州: 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2.10

(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

ISBN 7-5393-1196-7

I. 醴... II. 裴... III. 杂彩瓷(考古) — 鉴赏 — 醴陵市  
IV.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6843号

**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

**醴陵釉下彩瓷**

李建毛 丁送来 刘丰 著

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76号)

福州彩虹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2.5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5393-1196-7/J.1173

---

定价: 29.80 元

本书摄影：徐克勤  
黄 磊  
金 明  
易家敏

# 序

如果说要寻找一种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文明史的物质载体,那么就非陶瓷莫属了——华夏民族犹然。

描写一种文明的内涵及其高度,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标尺,但总离不了“技术”(广义)和“艺术”(广义)这两个层面。任何一种文明都必然蕴含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否则即不能成其为“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陶瓷自始至终都是技术与艺术的接合与交融。可以说,不懂得中国古陶瓷就不懂得中华文明。

瓷器是华夏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这一创造在西方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种东西始到西人那里,竟被认为是一种天然玉石雕琢出来的器物,他们没有想到除了上帝能用泥土捏成亚当与夏娃,谁还能用泥巴烧成另外一种人世间从未有过的物质!但摆在面前的事实告诉他们这决不是造物主之功而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在坚船利炮撞开所谓“四大发明”的原创国的国门后,“中国瓷器”,却仍然是华夏民族足以傲视西方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古陶瓷的收藏热、研究热方兴未艾,但目前坊间能看到的具有独立思考和新知新见的中国古陶瓷著述为数不多,有关中国古陶瓷的系列丛书也为数尚少,且多视角陈旧:或以朝代为线,或以窑口为线。前者以历代政权更替为线,人为割断了中国古陶瓷自身的发展历史,在阅读上也难免支离感;后者以地域窑口为线索往往缺乏对同一古陶瓷品种在不同产地的横向考察。因此决定以历代古瓷品种(名品)为线索和单元,出版一套“中国古代名瓷大系”,这将是一个展示和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新视角,恰当与否尚望海内外博雅指点。是为序。

裴光辉

2002年5月1日于泉州亦玩村

# 目录



## 序

|              |    |
|--------------|----|
| 一、醴陵窑的崛起     | 1  |
| 1. 醴陵制瓷之始    | 1  |
| 2. 醴瓷的转折点    | 3  |
| 二、不拘一格的造型    | 7  |
| 三、争奇斗妍的釉下五彩  | 11 |
| 1. 釉彩成份及彩绘工艺 | 11 |
| 2. 釉下五彩的成功烧制 | 23 |
| 3. 款识        | 60 |

## 醴陵釉下彩瓷

醴陵窑是湖南继长沙窑后的又一名窑，也是中国彩瓷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醴陵，位于湖南东部，与江西接壤。这里群山环抱、峰峦起伏，东、南、北三面，为罗霄山脉所盘纡，独西境为平野。渌水横贯东西，奔泻入湘。春秋战国时醴陵属楚地，秦时隶长沙郡，汉初封长沙相越为醴陵侯，东汉初置县。其土壤肥沃，自古为产粮区，家给人足。林木繁茂，燃料充足，瓷土资源丰富，是制瓷的理想场所。醴陵交通十分便利，渌水自古以来是醴陵的交通命脉，陆上交通也较发达，光绪二十年十一月湖南境内第一条铁路——萍醴铁路通车，大大改善了醴陵的交通状况，不久粤汉铁路的通车，又为醴陵产品南销打开了通道。

### 一、醴陵窑的崛起

#### 1. 醴陵制瓷之始

醴陵制瓷时代很晚，但制陶历史悠久，县城近郊发现有东汉制陶遗址，可知当时制陶已具相当规模。据载雍正七年，广



东人廖仲威向浏山寺僧智慧赁山制瓷，并邀来同乡技工陶、曾、马、廖、樊等20余人设厂制瓷，成为醴陵瓷业之篙矢。这20余人均为陶业世家，其先师为樊进德，明朝人，浏山有樊庙以祀其先师。天然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原料资源，促使醴陵瓷业迅速发展。嘉庆年间，形成以浏山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的产瓷区，赤竹岭、老鸦山、王仙观口、大小林桥、瓦子山、漆家坳、严家冲、前寨下、罗坪境、青泥湾、茶子山、塘山口等地都有窑址分布，自光绪十八年至光绪末年，是醴陵前期制瓷的鼎盛时期。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左右，全县共有瓷厂480余家，龙窑200余座，窑工数千人。

醴陵窑早期产品奉景德镇为主臬，以碗、碟为大宗，还有壶、杯、酒盏、调羹、坛、罐、钵、灯台等器物，各类产品因造型、规格和装饰不同，又分不同品种。多以釉下青花为饰，碗碟除各种专名外，也以花色分类，有鲜器、良器、可器、寿器、川器、工器、玉器、云器、蓝边顶等项，纹饰多为图案式。鲜器又有鲜大碗、鲜二器、鲜饭碗、鲜盂、鲜大令、鲜小令、鲜七寸盘、鲜五寸盘、鲜五寸碟、鲜四寸碟、鲜三寸碟等，饰萱草和洋莲组成的釉下青花图案。良器是因鲜器改良而名，有良大碗、良二碗、良三碗等，以粗点和圆点组成的青花图案为饰。可器原名荷花器，从“荷”字演变而来，绘蜻蜓戏荷图案。寿器是由鹿和寿组成的图案。川器由“川”字与古钱币图案组成。料器有料饭、料盂等器，饰釉下蓝边。光绪年间共有百余个品种。当时产品也按产地分类，有中枫塘货、浏北货、小路货三种，其中以中枫塘货为最上等，浏北货次之，小路货(除上两地之外的产品皆称之)最下之。



早期醴陵瓷质量与景德镇相去甚远，皆为粗瓷。拉坯、绘图系一人为之，说明作坊内尚无明确的分工。长沙等地瓷商称醴陵等窑的碗为“土瓷”，而称景德镇碗为“镇瓷”，售价也大不相同。

时国内所用细瓷为镇瓷、萍瓷(萍乡所制)和日本瓷。醴瓷出窑后，运至姜湾，客商云集采购，用民船装运出境。主要通过水运销往长沙、湘潭、常德及湖北之樊城、新堤一带。

光绪末年以后，由于细瓷的发展，粗瓷业不断萎缩，民国时品种渐减至40多种，但仍有一定生产规模。产品质量也不断改良，称为改良器。粗瓷和细瓷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并行不悖。

## 2. 醴瓷的转折点

醴陵制瓷的真正崛起，并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归功于产品革新。醴陵瓷业脱离景德镇的窠臼，光绪末期，熊希龄及文俊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熊希龄，字秉三，湘西凤凰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幼入私塾，14岁中秀才，17岁入湘水校经堂深造，同年中举，年二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十年随湖南巡抚端方东赴日本考察宪政，见京西、大阪、濑户等地产瓷精美，羡慕不已，回湘后决心振兴湖南瓷业。民国二年辞去湖南瓷业公司总经理职，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奉命组阁，阁员有梁启超、张謇等，时有“第一流人才内阁”之称。熊希龄一生致力于实业和教育事业。

文俊铎，字代耕。醴陵东堡人。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以一等知县候补湖北，后相继主管发审局、硝磺局与来凤厘局。中



日甲午之战，随吴大澂出关抗击日军，因计谋不被采用，辞归乡里。光绪二十一年，赴京应试，各省举人相约公车上书，力主变法，湖南由文俊铎首署。谭嗣同在湘成立南学会，由文领衔。戊戌失败后，避隐家乡，致力于公益事业。光绪三十年冬，与熊希龄同赴日考察教育与实业。

熊希龄、文俊铎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向湖南巡抚端方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强国富民之道和实业救国之策，主张在陶瓷工业区设瓷业学堂以发展湖南实业。为此，他们亲赴浏山、王仙等粗瓷产区和县城考察瓷业。光绪三十一年，在省府支持下，拨库银十二万两，二人在醴陵姜湾创立湖南瓷业学堂，培养技术人才。文俊铎任监督，聘日人马场梅吉等五人为教师，安田乙吉为技师。后改名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直隶学务公所。宣统二年，永久班并入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窑业科，湖南瓷业学堂改名湖南瓷业艺徒学堂，后又改为乙种窑业学校。学堂先后毕业生达千数百人，醴瓷改良之机由此开始。

民国七年，瓷业学堂改为湖南模范窑业工场，由省政府委人办理，生产一些质量较佳的作品，但产量不高，仅苟延残喘而已。民国十三年傅熊湘任模范窑业工场总经理，民国二十一年在傅熊湘倡议下，湖南模范窑业工场改为私营模范窑场。

光绪三十二年创设湖南瓷业公司，熊希龄自任总经理，装置机械，砌筑景德镇式和日本式窑炉，又从景德镇聘名师传授技艺。下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致力于生产高档细瓷。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间，瓷业学堂研制出5种高火性釉下颜料，从而烧制出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

釉下五彩瓷具有无毒、耐磨、耐蚀、永不退色的优点。釉



层光亮透明，晶莹润泽，釉下色彩缤纷，画面清雅瑰丽，墨线轮廓线焙烧后消失，形成醴瓷独有的“无骨画”效果，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高峰”。仅经营数年的醴陵瓷质量“赅赅乎与素负盛名之江西景德镇大有并驾齐驱之势，其所发明之釉下彩及颜料制造方法，当时且为景德镇所不及。”<sup>①</sup>

醴陵细瓷投放市场后，如同初放的玫瑰，芬芳四溢，赞誉有加。宣统元年在武汉举行的劝业奖进会上，获金牌奖；宣统二年在南京紫竹林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也获金奖；宣统三年在意大利都朗举办的博览会上又获最优奖；民国四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告竣，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醴陵瓷获金牌奖。屡屡获国际大奖，醴陵瓷器声誉日隆，中外皆知。据说熊希龄曾携醴陵细瓷贡呈慈禧太后，太后曾数视陈设中的景德镇瓷，熊氏唯恐太后说出“还是江西瓷好”，便从容进言说：“江西瓷已有千百余年之历史，醴陵瓷仅数年之功耳”<sup>②</sup>。听罢，太后也以金牌赏之。此事成为醴瓷的逸闻趣谈。

为了打开销路，公司在长沙、湘潭、衡阳、益阳、常德、醴陵六处设立销售处，称之为六承销。其产品全由六承销垄断。

民国二年，公司改为官商合办湖南瓷业公司。经民国三年水灾、民国七年兵灾之后，公司一蹶不振，民国十九年公司最后倒闭。

公司倒闭后，当地商人集资设厂，成立私营公司仿造细瓷。宣统元年(1909)首家私营细瓷公司普利制造公司创办，民国三年普利公司被湖南瓷业公司以2万吊钱收购，改为第二厂。民国

①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所编印《醴陵瓷业调查》，1942年出版。

②傅熊湘《醴陵乡土志·实业》民国十五年。



四年起陆续又有改良、德昌、舜业、裕华、中和、德厚、天保、淶口、湘澧、裕新等瓷业公司创立，至民国十二年，在东堡、洑山、姜湾、东门、上桂花、桥北一区、黄泥坳、青泥湾等，共有公司十余家，延聘瓷业学堂毕业学生、艺徒，或招聘景德镇技工，生产细瓷。城北姜湾、中和一带成为细瓷集中生产区。30年代后，私营细瓷业逐渐兴盛，1935年细瓷业有17家公司，77厂，职工6610人。此外，还有瓷业工人集资创办的知难合作社、群力合作社。抗日战争期间，景德镇瓷的销路被隔断，东南及西北各省瓷器市场几为醴陵垄断。厂家、瓷销商日渐增多，1940—1942年有细瓷厂118家，搭火烧瓷窑户73户，技工4190人，另外乡间原烧制粗碗的土窑者，也纷纷改为细瓷窑，年产细瓷2300万余件。1940年技工任大张、虞仕祥与八名徒工，制作了首批300—660伏针式瓷瓶，在荣庆祥碧玉瓷厂烧制成功。时粗瓷业也有较大增长，有厂138家，技工4169人，年产粗瓷由2400万件增至4800万件。醴陵发展成又一瓷都。

为进一步拓展销路，民国十一年，醴陵窑户组织窑业同业公会，要求政府收回承销处，招商承办，获得准许，于是纷纷成立窑厂及承销公司。抗战后，粤汉铁路通车，打开了南方市场，产品运销南洋群岛及欧美。

但醴陵沦陷，瓷厂倒闭、停业，数千瓷业工人失业，技工流失。1949年7月，醴陵仅有7家细瓷厂和部分粗瓷厂维持生产，职工千余人。1951年237家瓷厂复工，就业人员5568人，占全县就业人数的63%。同年城区部分私营瓷厂合并为一、二、三、四、五瓷厂，由长沙专署醴陵瓷业企业公司管理。几十年来，经过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及各瓷厂的努力，醴陵瓷业又取得

瞩目成就，瓷业至今仍是醴陵支柱产业。

## 二、不拘一格的造型

醴陵瓷的造型并不拘泥于景德镇的固定程式。

古代对陶瓷产品的产量、程式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各作坊只能根据规定进行生产，不能有丝毫改变。对此，傅振伦先生曾作了专门研究。据《考工记》三代时官府对每种陶器的式样甚至尺寸都作了详细规定，均有固定的法式。上古百工，“典制六材，陶旒之工曰土工”。“抔埴之工，陶旒”，陶人制作甗、盆、甑、鬲、庾。每种器物的大小都有严格的规定，如盆实二鬴（四区，容六斗四升）。《考工记》还记载其容量、厚度、唇长。《礼记》礼器注，容五斗、壶大一担。《周礼·醴人》有瓮，《山堂考索》记录了它的容量、高度、口径、腹径、底径。《周礼》有六尊六彝，《山堂考索》也注明其容量、口径、胫高、中横径、底径、腹径、厚、底厚。”<sup>①</sup>东周时期酒器都有“经程”，《韩诗外传》载：“齐桓公饮诸臣酒，令曰，后者罪一经程”。秦汉瓦当之所以有如此强的艺术性，就是官府任用文人设计式样的结果。唐五代官窑尚未正式出现，官府对瓷器的需求，往往通过“依式定货”取得，即官府出示产品式样，到名窑定货，唐代高级贵族墓中出土的三彩马都是三花饰马，是按“官样”生产的，有白居易诗：“风笺书五色，马鬃剪三花”为证。宋代楼钥《再题韩干所绘十匹马题名》：“国人贵解多雍容，三花剪鬃自官样。”鲜于庭诲和永泰公主墓中出土的马都是如此。汝窑青瓷受越窑的影响已为学术界所共识，1989年在宝丰清凉寺发现两件上林



湖窑秘色瓷盅，被认为是官府发出的样品。宋官窑产品的式样及数量均由皇宫直接下达。浙江上林湖是承接官府用瓷的重要瓷窑，张家埭窑址出土的一件莲瓣纹残碗，上有“官样”二字，似是御窑碗式。这种官样的残件标本，越窑已发现4件。庄季裕《鸡肋篇》卷上载处州龙泉县出青瓷器，“又出青瓷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廷制样索须，益加工巧。”另周辉《清波杂志》载进贡之御炉炭作胡桃纹鹑鸽色，即是“有司降样”所要求的纹色。民窑也有程式可依，民窑宋时流行瓷灯，“惟瓷灯最省油”，时也有其法式，“灯盏，法高七寸，盘高六寸，受盏圈径二寸半，择与圈称者。”<sup>②</sup>瓷枕生死者所用各有不同，《考盘余事》：“旧窑枕长二尺五寸，阔六寸者可用；长一尺者谓之尸枕，乃古墓中物，虽宋定瓷亦不可用。”

明清时期御窑生产也是由内府下达生产品种、款式、规格、纹饰和数量。“凡器之成，必有依准”<sup>③</sup>，甚至连款式也有法定的书写格式，款式内容、书体、布局、边框等都承有旨意。“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饶、处等府烧造。”<sup>④</sup>正统三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又于正统九年，“……仍敕内官样，赴饶州更造之”<sup>⑤</sup>。仅嘉靖年间就多次下发瓷样，十五年，降发瓷器样10样，十八年又降发瓷器2样，43件。清根据瓷器的不同用途，对其式样、尺寸作了严格的规定，《钦定皇朝礼器图式》：祭祀“天坛用青花，地坛及社稷用黄色，夕月坛用白色，朝日坛用红色”。盛酒大蓝花瓷碗，上径一尺一寸七，高五寸三分；盛醴酒蓝花瓷樽，高一尺六寸五分，中围径一尽一寸，底围径七寸；求福盛鱼蓝



花瓷碗口径五寸五分，高三寸七分：盛清大蓝花瓷樽，高一尺一寸七分，中围径二尺八寸七分，底围径五寸四分。康熙年间，刘源曾献瓷样数百种，“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⑥有时皇上发现其它质地的器物如金银器、漆器式样佳者也会命其生产，并对釉色、尺寸作些补充规定。由于工匠无权修改产品的造型、纹饰、生产工序，他们在严格的监督下劳作，不能发挥自己的创造灵感，只能刻板地按官府预先设计的式样、纹饰摹仿制作，其造型、纹饰往往是严谨规整有余，而活泼不足。其常用图案在雍容华贵中透着几分俗气，特别是晚清官窑，只会抄袭前代式样，缺乏创新之意。官府陶瓷作坊与民营作坊一项重要的区别，就是官府作坊本身没有生产的自主权，作坊自身不能决定生产产品的种类、式样和数量，这些均由官府决定。

1983—1985年两次对景德镇龙珠阁御窑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不少瓷样标准器，白釉瓷盘有“戊四十九号十八样”、“戊五十三号五十年样”等，青花瓷碗盘底书“二十年戊七十号”、“□□□五十七年样”，绿釉瓷碗有“善字八号乾隆二年样”，蓝釉瓷碗有“六十年试样戊七十六号”等瓷样。此外还有青花、豆

①傅振伦《中国古代制造陶瓷的规范》《东南文物》第一辑。

②陆放翁《斋居纪事》。

③唐英《陶冶图说》卷二。

④《大明会典》卷一九四“陶器”条。

⑤《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四九。

⑥《清史稿·刘源传》。



青、茶叶末、白釉等各种试样共 13 件。<sup>①</sup>《陶录》：“宋器仿于明，即景德之镇窑，曾经内府发器样，故又称呼‘发宋器’”。雍正七年四月十三日“圆明园来贴，太监刘希文交来成窑五彩磁罐一件(无盖)，传旨，着做木样呈览……将此罐交年希尧添一盖，照此样烧造几件……”<sup>②</sup>民窑也是根据官窑规程和款式制作，仿官器尤为如此。

醴陵瓷则打破了这些造型和装饰上的程式，变化而不失比例，装饰感强。细瓷分圆器、琢器、辘轳、模型器四类，各类产品都有众多造型和规格，如碗类圆器产品，按造型有锅器、罗汉器、汉饭、茶盅等，盘、碟类产品按造型有折边器、锅边器、法口器等，按口径有尺二、满尺、九寸、七寸、二寸、元托等。琢器有壶、瓶、坛、罐、缸、钵、盒、帽筒、饭鼓、香炉等空心器皿。三班器是介于圆器与琢器之间的产品，主要为各式盖杯、直桶杯、茶杯、痰盂等。仅花瓶而言，有小至几厘米，高至两米多者，造型“有的庄重，有的秀丽，有的端巧，有的挺拔，有的饱满，各具特点，各有风貌”<sup>③</sup>，模型器有日用器皿和雕塑美术瓷，日用器有调羹、模花壶、皂盒、奶盅等，工艺瓷有雕壶、花瓶等。据 1946 年统计，细瓷产品有五百多种，其中圆器二百余种，琢器一百六十多种，三班器一百余种。产品圆器最多，但以琢器、模型器造型最具特色。

艺术器、礼品瓷有些既可看出受景德镇程式的影响，但又有变化，有的则是醴陵工匠们的新创。百花风尾瓶与景德镇凤

① 《考古学报》1989 年第 4 期。

② 《中国陶瓷史》第 433 页。1997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③ 邓文科《醴陵釉下彩瓷》，1984 年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尾尊在似与不似之间，一些花瓶或根据景德镇观音尊、胆瓶、蒜头瓶、琵琶尊、赏瓶等的某一种造型取材，有的则根据几种造型综合改造而成。这些多为学员的实习作品，或官宦之家定制的礼品，因其做工考究、绘画精美，同时配以款识和题签，每件瓷器便是一件艺术品。

## 三、争奇斗妍的釉下五彩

### 1. 釉彩成份及彩绘工艺

醴瓷装饰有釉上彩绘、釉下彩绘、釉上贴花、釉下贴花几种手法。

釉上彩始于光绪末，初为红彩和粉彩，民国初发展为釉上新花。釉上彩有提白器(白器之最好者)和普白器两类，分两次烧成，在白瓷上彩绘，再置于750—850℃的烤花炉中，以松柴、木炭焙烤5至7小时，便呈现出光亮晶莹的彩色画面。有珊瑚、玛瑙、象牙等色，当时有专营釉下彩瓷的彩花红店，他们从其它作坊购买细瓷白坯，加绘各种花卉、翎毛、走兽、人物、山水、图案以及题词(如图1釉上彩树鹰瓶、图2釉上彩花鸟瓶、图3釉上彩花鸟瓶)，亦有贴花、刷花者，再入红窑烧之，使彩绘与釉结合，颜色鲜明，可经久不退。其售价要比白瓷高出2至10倍。1950年改用雕刻画面纹样皮印，沾色印于白瓷上，然后用毡印油色套色，俗称釉上印花。1958年国光瓷厂张邵年又研制出伴形印花机，较手工印花效率高达5至6倍。

釉上彩彩料，据1948年修《醴陵县志·食货志》载有以下几种：

